

《金瓶梅》与兰陵文化研究

李汉举 著

兰陵文化研究丛书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 编 颜炳罡 王晓军
副主编 孙 涛 徐庆文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兰陵文化研究丛书



《金瓶梅》与兰陵文化研究

李汉举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兰陵文化研究 / 李汉举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8

(兰陵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09-07423-0

I. ①金… II. ①李… III. ①《金瓶梅》—文学研
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9528 号

责任编辑: 周云龙

《金瓶梅》与兰陵文化研究

李汉举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13.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423-0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 2925888

《兰陵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 庞 朴 杜维明

荣 誉 主 编 丁冠之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志民

编委会副主任 郑连胜 王晓军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孔宝	王 广	王 春	王志民	王晓军
王晓凌	卢永凤	闫春新	刘 震	孙 涛
孙天胜	吴世强	杜泽逊	李汉举	李善东
李洪彦	苗润田	杨朝明	范玉秋	金贞姬
周元侠	郑连胜	赵卫东	高新满	徐庆文
郭海涛	焦子栋	颜炳罡	穆振昂	

主 编 颜炳罡 王晓军

副 主 编 孙 涛 徐庆文

序 一

由颜炳罡、王晓军主编的《兰陵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使齐鲁文化研究的局面为之一变：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开拓了一个重要领域，引领出一支科研新军，让人欢欣鼓舞，可喜可贺！

兰陵，是个历史名邑。从楚国在这里设县算起，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鲁国在这里设次室邑算起，兰陵古镇已存在两千六百多年了。然而，兰陵之“名”，还不仅仅在其历史悠久，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颗照耀历史夜空的明星。在百家蜂起，文化昌隆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文化史上“轴心时代”的战国时期，这里就曾放射出璀璨的文化之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春秋以后，角战群雄”，“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可见，当时的兰陵，实为与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比肩的文化中心。秦汉以后，这里更成为人才辈出，名人荟萃之地，王臧、匡衡、萧望之、疏广、疏受、王良、鲍照，何承天、何逊、徐陵、颜师古等都出自兰陵一带，李白有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位饮遍天下名酒的诗仙所夸赞的大概不仅是酒品之高，也在赞其酒出名郡吧？足见兰陵历史文化既多姿多彩又源远流长。

在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当今山东区域文化中，兰陵文化具有重要地位又别具特色。兰陵地处山东南大门，北依泰沂，南控江淮，自古为南北交通战略要地。自春秋时期的吴楚争霸，到秦末的楚汉相争、两汉之交的刘秀争帝、三国时代的曹、刘争雄，乃至在抗日战争时期之民族存亡决战，都在这一代演绎过壮烈的历史画卷，记载着兰陵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同寻常的贡献。而尤为重要，它是中华民族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地区，如果说，草原文明、黄河文明代表着中国的北方文化，长江文明代表着中国的南方文化的话，那么淮河

流域则是南北两大文化的交汇地带，而兰陵就是淮河文化的一个重镇，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区域。春秋时期吴越与齐鲁文化的交流，战国时期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交流都离不开兰陵文化的贡献。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竹简中发现了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对战国时期齐鲁之地的儒家学说如何在长江流域传播展开了持久深入地探讨，认为，这将改写先秦学术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思孟学派成熟于战国中后期，而兰陵文化的繁兴也恰在战国中后期荀子为兰陵令之后。荀子少年游齐，久居稷下，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由齐之楚，两度出任楚国的兰陵令，在给兰陵带去齐文化的同时，还以其在当时鲜有人比的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前来兰陵从学、研究。荀子是儒学大师，在他传授和影响下，形成了兰陵多善为学的传统，使兰陵成为战国中后期中国文化的高地和学术中心。时代已很久远，我们也许没有更多直接的资料来论证郭店竹简显示的儒学是如何从邹鲁传播到荆门的，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儒学在楚国，乃至在整个长江流域的传播，很有可能是以兰陵作为基地和桥梁的。这也诠释了两汉魏晋时期兰陵经师群崛起的历史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省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齐鲁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很多努力空间，其中，兰陵文化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发掘研究就是一个缺憾。这是与兰陵文化的地位、贡献很不相称的。值得高兴的是，由颇具才气的知名学者颜炳罡教授主持的这套丛书，填补了这项空白并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这是兰陵文化研究的学术奠基工程，也是齐鲁文化研究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粗阅该丛书的提纲和有关内容，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学风端正，基础扎实。本套丛书对兰陵文化的研究界域、范围、对象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详细阐述了兰陵文化与古郢文化、古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关系。指出兰陵文化是指以兰陵古镇为中心，以今日苍山县域为核心区，曾生活于这一区域的人民及其后世子孙所创造的文化总称。在具体研究中，作者既注意到行政区域在某一特定时期边界的确定性，又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区域边界的相对性与模糊性，这种开放、科学的学术理念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其二，设计合理，思路清晰。本套丛书在整体规划上，既注意到了兰陵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又注意到兰陵文化本身的特点、重点。在本套丛书中，既有对兰陵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如兰陵文化通论，也有对兰陵文化的某一层面问题的考察，如兰陵礼俗文化研究、兰陵经学研究等等；既有对兰陵显赫士族的研究，如兰陵萧氏、何承天与兰陵何氏，也有对兰陵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如荀子、颜师古等，这就既突出了兰陵文化的重点，又兼顾兰陵文化全貌，总体学术设计和研究方法都是值得肯定的。

其三，精析提炼，多所创新。作者对兰陵文化特点的概括、提炼以及对兰陵文化在南宋以后衰微学术原因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对兰陵文化兼融中国南北文化特点的分析，对兰陵文化重经史诗文而轻义理的特点分析，对兰陵文化多善为学、重情惜义的分析等等，都眼光独到，颇具说服力。

其四，突出重点，深入探究。作者对荀子与兰陵文化的关系进行浓墨重笔地深入研究。重点挖掘荀子在兰陵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就抓住了兰陵文化研究的关键部位。兰陵萧氏，南迁之后，家族繁盛，齐、梁时期高登帝位，是南北朝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皇族，作者列专题研究这就抓住了兰陵文化研究的重点环节。丛书还对两汉魏晋时期兰陵的经师群进行重点梳理、个案研究。这都是颇有学术识见的安排。

当然，该丛书的出版，对于博大精深的兰陵文化研究，应该只是个坚实的开端。期望该课题组和省内外学术界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对兰陵文化的研究。兰陵是齐鲁的，更是中国的，我们应该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开拓和深化对这一区域文化的研究，切盼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王志民

2013年初夏时节

序 二

我们所说的兰陵文化是指以兰陵为中心，以当代苍山县域为主体，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民及其后世子孙所创造的文化总称。季文子、荀况、朱儒、贾仲明等等，虽然他们的祖籍或出生地并非兰陵或苍山区域，但他们或主政兰陵，或定居兰陵，或讲学、著述于兰陵，或葬在兰陵，他们对兰陵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都做出了贡献，因而这些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如果兰陵文化研究缺少了荀子，正像鲁文化研究缺少了孔子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萧道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何逊、何子澄、何子朗、王肃等等，其出生地未必是今天的兰陵或苍山区域，然而，他们都是兰陵人的后世子孙，自然也在我们的研究之列。像当代华人世界的散文巨擘王鼎钧，由于他世世代代生活于兰陵，本人又出生于兰陵，虽然他的文化成就不是在兰陵取得的，而是在台湾乃至在美国取得的，但其散文散发着兰陵泥土的芳香，其文化成就无疑是兰陵文化的当代表现。

行政区域的边界在某一时期是明晰的，而任何区域的文化边界都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交叉、重叠的，兰陵文化尤其如此。历史上，兰陵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是变动着的，而今天的苍山县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形成的一个行政区域，在行政区域上，兰陵与苍山未必完全重合，但在文化区域上，二者大致等同。

战国末期，楚人设兰陵县，春申君任荀况为兰陵令，荀子所管辖的兰陵究竟有多大，边界在哪里，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现在的兰陵只是苍山县的行政镇而已。当然，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兰陵镇。道理很简单，兰陵在历史上主要不是作为一个镇、一座古城邑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县、一个郡而存在。与之相应，兰陵文化的研究应当是一个县域文化研究，而与兰陵最相关、与历史上的兰陵区域大体相当的县也只有苍山县，因而，兰陵文化当然以兰陵古镇为中心，以当代苍山县域为主体，略涉、或引申到周边地区。因而兰陵文化与原

临沂县、郯城县、费县等区域文化就会有重叠、有交叉。在研究中，当涉及原临沂县、郯城县、费县乃至峰城等地时，恳请上述地区的学者、乡亲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有意越界或侵犯，而是客观上文化边界的相对性及模糊性而研究上要求完整性、系统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通过研究，我们对兰陵文化有几点认识。

一、兰陵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据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苍山下村王岭、二庙乡吴庄村、小古村、于官庄、大仲村的东城子村、向城乡的城子村以及邻县郯城的褚墩风渡口村、港上乡的停庙村等等，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而苍山县二庙乡吴庄村不仅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存留。如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兰陵地区（本书以后提到的兰陵地区是指今天苍山县区域）的考古发掘串联在一起，可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夏、商、周一直延续到当代，这一人类文明链条几乎没有中断过，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谱系。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先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

自夏代起，中华文化进入国家制度文明，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两个古国，一是古郯国，一是古邾国。郯国遗址在今山东省苍山县向城西北，距兰陵镇 16 公里。《世本·氏姓篇》载：“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郯，襄六年，莒灭之。”《齐乘·古迹》载：“古郯城，峰州东八十里，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郯。传国至春秋。襄公六年莒灭之。后属楚。汉晋并为郯县。”少康，夏王相之子，为夏王朝的第六位国君，为维护夏王朝的统治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中兴之祖之称。曲烈，少康的第三子。古郯国，历史悠久，历夏、商、周而存在，直至鲁襄公六年为莒国出兵所灭。

兰陵在古代郯国疆域之内。古郯国夏代立国，远离京畿，势力一直不大，处于不被各方政治势力看重的地位，可以不选边站，故而在夏、商、周三代更替中得以保存下来。古郯文化是华夏文明进入国家制度建立以来兰陵文化的最早来源。

与兰陵文化相关的另一国家是古邾国。邾国，少昊氏后裔之国，属于典型

的东夷文化，这个国家可能比古鄆国历史还要悠久。少昊氏乃黄帝之子，其部族以鸟为图腾，现代史家多以为其所处相当于大汶口时代。郯国这个古国历夏、商、周，至战国时犹存。

郯国之所以有名，在于郯子与孔子的关系。《春秋·昭公十七年》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郯子对其先祖的典章制度了如指掌，以其对历史的稔熟而轰动朝野，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自然在情理之中。王肃认为郯子达礼，孔子故谥问焉。

我们认为，鲁国与郯国相去不远，孔子适郯，问官于郯子，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孔子之郯”之行，不仅仅是向郯子学习，同时，也为郯国带来了儒家文化。在郯，孔子路遇程子，倾盖相谈，在郯城县县城北十里处，后人建有“倾盖亭”。这里附近还有一座山，相传孔子与郯子一起登山望海，故此山名曰孔望山。

不少学者认为古郯国国都在今郯城县西南境，而郯西南 20 公里左右地方的相关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郯西面与兰陵为邻，今日苍山县的层山镇、庄坞镇、二庙乡、磨山镇、神山镇、长城镇等地当属古郯国。郯文化对兰陵文化的影响一点也不逊于鄆。由于鄆、郯地相近，国家命运大致相同，极易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念、生存法则乃至文化传统，鄆、郯对兰陵文化的影响既是重叠的，又是一致的。

二、兰陵文化是中国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体现着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双重品格

鄆国、郯国都是鲁国的附庸国，鄆、郯、鲁三国间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鄆、郯对鲁国文化有影响，但远远小于鲁国文化对鄆、郯文化的影响。鲁襄公

六年（公元前560年），莒国灭郕，郕国原来的土地归入鲁国，鲁国在这里设次室邑，自此以后，兰陵成为鲁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兰陵文化本质上是齐鲁文化。荀子主政兰陵之后，又将三晋、齐文化带入兰陵，使之成为兰陵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

兰陵文化是齐鲁文化这一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然而这个子系统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因为它不仅仅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吴、越、荆楚文化对它的影响也不容低估。在春秋战国时代，兰陵是四战之地，吴越北上争霸，楚国力量北扩，这里是必经之地。吴王夫差七年，与齐战于艾陵（今泰安），大败齐国，至郕，召鲁哀公而征百牢，季康子派子贡为使，才化解了这次外交上的尴尬。吴国一直北上与齐争霸，长期驻军齐鲁之南，次室邑（兰陵）作为鲁国的南方重镇，这一区域不能不受到吴文化的影响。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国势力大振，公元前468年越人乘机北上，将国都迁到山东南部，次室邑（兰陵）又不能不染上越文化的色彩。后来楚国强大，占领大片齐鲁等国的国土，公元前261年，次室邑（兰陵）为楚国所占，成为楚国一部分。楚人在这里设县，始有兰陵之名。由此可见，吴、越、楚等国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对兰陵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兰陵文化是齐鲁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结晶品。如果说齐鲁文化代表着黄河文化，而吴越文化和楚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话，那么可以说兰陵文化自先秦时代起就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兰陵仍然设县，为县治所。南北文化的融合并没有因秦的统一而停止。兰陵处于中国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过渡带上，而中国文化无论自北向南运动，还是由南向北运动这里都是必经之地，成为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区域。

在王莽新朝向东汉过渡时期，兰陵再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不同的军事势力都曾在这一区域横刀立马，相互厮杀。东汉末年，曹操以为父曹嵩复仇为名，东征徐州。“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魏武本纪》）。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士族为避战乱而纷纷南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公元307~313年）南渡。兰陵萧氏、何氏、鲍氏，琅琊王氏、颜氏

等等纷纷南渡，兰陵文化南移，给南方带去了文化的繁荣，也将兰陵文化推向了新高度。

公元383年东晋和前秦发生淝水之战。东晋获胜后，乘胜北伐，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兰陵回归东晋，江南文化随着东晋统治者的到来再次被带入兰陵。

北魏（公元386～534年）鲜卑政权于公元439年完成北方统一，公元468年1月攻克刘宋固守的兰陵县城，兰陵归入北方鲜卑人的统治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粗犷与豪放的性格对兰陵一定会产生影响。鲜卑民族自身推行文化上“汉化”政策的同时，也从事着对汉民族的“化汉”工作，兰陵文化又融入了北方游牧文化的因素。

兰陵地区一直处于中国文化南北的过渡地带，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南征，这里都是必经之地；而每一次北伐，这里又是必过之路，这一过程几乎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始终。这种南征北伐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兰陵文化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

三、荀子是兰陵文化的开创者，在兰陵文化居于中心地位

荀子既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大儒，也是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是战国晚期中国思想界最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中国文化的传人。他的思想以儒为主，兼综名、墨、道、法，尤善《诗》、《书》、《礼》、《易》、《春秋》，融合诸子而超越诸子，汇通百家而超越百家，直追孔子，这就是荀子。荀子既是兰陵文化的开创者，又是兰陵文化第一个辉煌时期的缔造者。荀子离齐适楚，两度出任兰陵令，在兰陵讲学、著述，安家，最后葬在兰陵，由此开创了兰陵文化的辉煌。

在荀子的治理下，兰陵很快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高地。荀子到来，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慕名而来，有些人后来成为左右中国历史命运的人物。刘向《孙卿书录》谓：“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胡元仪《郇卿别传》说：“韩非、李斯、陈嚣、毛亨、浮丘伯、张苍而已。当时甚盛也。”韩非、李斯、陈嚣、毛亨、浮丘伯、张苍等等，都是当世之杰，他们不远千里，前来兰陵求教，兰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

荀子对兰陵文化的影响，刘向《孙卿书录》有精彩说明：

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

荀子“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这就说明《荀子》一书是荀子在兰陵完成的。“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这就告诉我们，荀子开出了兰陵人好学、善学的传统，由此他也赢得了兰陵人的尊重。兰陵人十分崇敬荀子，喜用“卿”为字，以表示对荀子的纪念与敬重。兰陵文化之所以在两汉、魏晋时代，经师辈出，南北朝时期出现像萧衍、萧纲、萧绎这样的文人皇帝，出现如萧统、萧子良、萧子显等重视文化的皇族子孙，荀子之功盖莫大焉。无荀子，“兰陵文化”这一概念就难以成立；无荀子，就没有兰陵文化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繁荣。

四、兰陵人“多善为学”，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方圆不足百里的空间里，在苏鲁文化交汇地带，出现如此多的文化名人，堪称中国县域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兰陵人好学、勤学，主张终身学习，从《荀子》的《劝学》到《颜氏家训》的《勉学》、《名实》、《文章》等等，充满着重视学习和对学习规律探索的内容。这些文章告诉我们：从最低处讲，通过学习，哪怕你只要掌握或熟悉一部儒家经典，就可以满足谋生的要求而生存下去；从高处说，学习文化可以改变命运甚至扬名后世、光耀门庭。自古及今，兰陵地区好学、苦学、勤学、乐学的事例并不鲜见。匡衡凿壁引光的故事已成为勤学的千古典范！何承天观察星象运行规律四十余年，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元嘉历”。南朝萧氏一门，萧子良、萧子显、萧统、萧纲、萧绎等等，身为皇子，精于经史，兼通佛玄，擅长诗文，虽治国功业不显，而兰陵文化勤于学习的传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北齐、北周相继灭亡，颜之推及其子孙

流落关中，既无官俸，又无积财，在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状态下，他不断督促儿孙学习，要勤于经史，而不能弃学徇财，以丰衣食！在兰陵的历史上，勤学、苦学、好学之所以形成传统，原因在于兰陵人知道学习可以改变贫且贱的命运，通过学习而改变命运者在兰陵大有人在。如萧望之出自农家，匡衡是穷人，通过学习都位列人相，官居要职。于腾，早年为人牧猪，通过学习，考取进士，官至成都代理知府；陈敬修，出身贫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通过学习，终成进士；王鼎钧，半生漂泊，不废学习，通过自学，终成当代散文名家。这些历史上成功的案例，都激发了兰陵人学习的热情。

兰陵人好学、多善为学的传统，促进了兰陵文化的发展，成就了兰陵文化的辉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长达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多善为学”的兰陵人，经师文士，群星闪烁，熠熠生辉，映衬着中国文化的天空。如王臧、缪生、褚大、孟卿、孟喜、后苍、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毋将隆、毋将永、段嘉、王良、缪袭、缪悦、缪播、王朗、王肃、何承天、颜延之、颜之推、鲍照、鲍令暉、何逊、何子朗、何子澄、萧统、萧纲、萧绎、萧子显、萧子良、徐勉、徐悱、徐摛、徐陵、颜师古、萧颖士等等。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兰陵的文化名人，以两个类型居多，一类是经师大儒、学问家，一类是诗人文人、文学家。经师们或设帐授徒，毕生致力于中国经籍的传承，或通经致显，以经术论政事，他们在诗学、书学、礼学、春秋学、易学等的传承与研究中都因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为一代名儒；而文人骚客们则长期引领着中国诗文的创作形式，掌握着中国诗文发展的话语权。从“永明体”到“宫体诗”，从骈文到古文，兰陵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重家教、尤其重宗法血缘或家族代际传递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是兰陵文化传统，而在家教中的“重文轻财”可谓兰陵文化的特色

无论是文人，还是经师，在兰陵地区多是以宗族或家族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萧氏、何氏、颜氏、徐氏、王氏、缪氏等都是以氏族为纽带，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于中国的文化舞台。

兰陵地区非常重视家族教育，由此成为全国家教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在其家教中重文轻财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疏受、疏广居官数年，致仕返家，不留金银给子孙的故事流传千古。而齐梁时代的贤相徐勉是“二疏”精神的传承者。他居官家无蓄积，要留清白遗子孙。史称其“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有人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辂；如其不才，终为他有。”他在写给儿子徐崧的《诫子书》中说：“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梁书·徐勉传》）

《颜氏家训》乃中国家训之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为系统的家庭教育的经典之作。《颜氏家训》特别要求子孙们“务先王之道，绍先世之业”，而不是追求食甘衣暖！《颜氏家训》强调“积财百万，不如薄伎在身。而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勉学》）。从“二疏”、徐勉的《戒子书》到《颜氏家训》，一再诠释着兰陵文化家教中重文轻财的传统。

降至明清两代，在兰陵地区以宋氏家族、王氏家族、杨氏家族最为显赫，重文轻财的家教、家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又增加了新内容。无论是宋氏，杨氏，还是王氏，在注重文化传承的同时，也注重公益事业，修桥铺路是这些氏族大家的重要工程。这一方面说明兰陵文化重视血缘亲情，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宗亲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兰陵人非常重视文化在家族内部代际之间的传递，以保证文化香火不断。

六、惜情重义、民风剽悍是兰陵文化的又一特点

兰陵，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地近邹鲁，其民风淳朴，崇尚礼让，与邹鲁无异。《文献通考》谓：“西晋之末，为争战之地，百年间伤凌滋甚。自宇宙平一，又如近古之风。”南宋祝穆《方輿胜览》称：此地“民无争斗”。不过，到了隋代，其民风有所变化。《隋书》卷三十一描述了战国时代楚、宋、鲁交界之地的民风。楚、宋、鲁之交的核心区域当然兰陵地区在其范围之内。“考

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穡，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兰陵民风，“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在隋代已有显露。

明清以来，“劲悍轻剽”、“挟任节气”之风，进一步得到发扬，由古之“民无争斗”变而为民风剽悍，民不畏斗，这是时势逼迫的结果。由于地处苏鲁边界，原临沂县、郯城县、费县、原峰县等交界之地，加之战乱、水患、瘟疫、地震、蝗灾等等不断，民不聊生，匪患不断。19世纪下半期以后，在政府瘫痪、社会失控的状态下，民众只有武装自卫。要自卫，就需要有强健的身体，这里不少村庄有尚武之风。长拳、洪拳、少林拳、查拳等等在这一地区十分流行。秋收已毕，农闲时节，到处可见拳师带着青年人习武，这种风气相沿已久。晚清以来，乡绅所办团练及民间自发的义和拳、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会党，平时为农人，战时为战斗人员，人数或多或少，忽而成群，忽而离散，由是养成了剽悍的民风。这种豪放的性格与剽悍的民风造就了兰陵人敢于反抗一切压迫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兰陵人惜情重义，慷慨好义，非常重视亲情、友情。这种惜情重义，体现在文人那里叫做性格豪放，而由普通百姓呈现出来就是民风剽悍、有肝胆、敢做敢当。“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可谓兰陵人性格的真实展现。“菩萨心肠”是讲兰陵人有仁爱之心，心肠比较软；“侠士胆”讲出了兰陵人的风骨、气节；“霸王魄力”表现了兰陵人的气概，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顶天立地；“屈子愁”是说像屈原一样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菩萨心、侠士胆，霸王力、屈子愁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地组合在一起就是兰陵人性格的生动写照。在民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乞食”，这句话在兰陵地区十分流行，体现了兰陵人宁折不弯的刚强性格。

兰陵文化形成于战国，兴盛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以下，兰陵文化走向衰微，是什么原因导致兰陵文化走向衰微的呢？人们可以从社会、行政区划、经济状态、漕运等方面去分析其原因，从文化发展与演变规律的角度讲，兰陵文化的衰微也可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了。

北宋以来，中国学术发生重大转变，即由重经学到重子学的学术变迁，这

一转变与兰陵的学术传统不尽相合，兰陵文化未能领导这一转变，其不显辉煌也就在所难免了。兰陵人多善为学，主要是经学、文学两途。自汉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兰陵文化精于训诂，工于书隶，重文化传承，而不重思想义理的创新，这不能不说是兰陵文化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虽然，兰陵萧氏如萧子良、萧衍以至于唐代的萧瑀等等佞佛，梁元帝萧绎大谈三玄，而颜延之、颜之推也不排佛而是力图融通儒佛，萧氏媚佛而不善于消化佛理终难形成自己的思想系统而别开生面，颜氏试图融通儒佛但是安史之乱后，舍家卫国，元气大伤，都没有在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再造中国儒家义理的历史重任中展现出才华，兰陵文化衰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年多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艰苦工作和精心研究，《兰陵文化研究丛书》终于完成并行将与读者见面了。在此，我们倍感怀念已经离开我们三年多的丁冠之教授。丁教授是兰陵文化研究倡导者，也是本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本套丛书的出版是对丁教授最好的纪念。感谢临沂市委宣传部、苍山县县委县政府、山东大学相关单位给予本套丛书的无私支持与大力帮助！感谢五年以来与我一起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各位学者、专家和青年朋友，没有你们的努力工作、刻苦钻研，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由于县域文化研究对我们而言毕竟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而对兰陵文化展开系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加之我们才疏学浅，学术水平有限，因而本套丛书肯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足乃至错误，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颜炳罡

癸巳年夏日于大明湖畔